

军史发现

清凉山,红色的新闻山

李超

记史

夜色下的清凉山光彩夺目,从远处望去,清凉山仿佛一艘巨轮,从历史的大潮中缓缓驶来,带着沧桑和厚重,让人心潮澎湃。

1937年至1947年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清凉山曾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社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众多新闻出版部门所在地。这里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摇篮。

见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绝对领导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改选后成立的中央政治局于1月27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其中一项决议为: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

193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以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领导机构中仍设领导党报的机构,名称稍有变化,称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由张闻天兼任。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设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仍由张闻天兼任。

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央党报委员会这一机构就消失了。直到1937年1月,中共从保安(现志丹县)迁到延安。为了适应西安事变后形成的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党中央把《红色中华》易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社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同时决定由张闻天、凯丰、秦邦宪、周恩来等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央党报委员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



图①:延安时期,中央印刷厂工人加班加点印制新闻产品。图②:延安时期编印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参考消息》以及业务刊物《通讯》。图③:修建在清凉山下的延安新闻纪念馆。

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机关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因此,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仅仅是个对内称呼,对外通称“解放社”。

随着新闻出版业务的不断发展,中央党报委员会下辖的新中华报社、新华社、中央印刷厂蓬勃开展。

“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

回溯新华社的历史可以发现,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社通讯社。社长秦邦宪,主要工作人员有廖承志、李柱南、向仲华等人。1939年初,由于业务发展,新华社成为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仲华为社长。

新华社担负着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具体有两个方面的业务: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这些电讯是新华

社国际消息的主要来源,经过翻译、编辑,然后再发给各地报纸刊用,使根据地人民能及时了解到国际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动向。另一项业务是编写广播新闻稿件。根据抄收到的中外电讯,综合编写广播新闻稿件送电台播发,每日2000至3000字不等。

为了突破国民党对我的新闻封锁,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10千瓦的苏制广播发射机。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有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新华社负责人向仲华等。

为筹建广播电台,大家不辞辛劳,昼夜奋战,在山坡上开凿了两孔石窑和五孔土窑,盖了十几间土坯石房,分别用作播音室、播音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等。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动机发电,还把三根树干捆成“Y”字形栽在山坡上

支撑天线。1940年12月30日晚7时,延安的窑洞中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按照规定,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第一字母是X,作为新华社的一个下属机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英文缩写是NCR。

1946年6月,驾驶飞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有了更多了解,才愤然起义,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电台首次进行日语广播的播音员原清志是一名日本人,她的丈夫是一名日本共产党员。来到了中国后,原清志参加了八路军,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一名播音员,她播送的日语广播起到了瓦解日军的作用,一些日军士

兵受到广播感召后,主动投降。为此,日军甚为不安,只能采用大功率电台进行干扰。

1949年12月5日,历经两次更名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北京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合并、改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创办一张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报名,并撰写发刊词。第一任社长是秦邦宪,第一任总编辑为杨松(原名吴绍缙),社址设在延安的清凉山。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通知》要求,“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

第二天,秦邦宪在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上主动检讨了办报10个月来的主要缺点,同时提出了今后的办报方针和初步的改版方案。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彻底扭转了原先重国际轻边区的报道倾向,大大扩充了报道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的篇幅。

报纸的头版头条刊发了秦邦宪起草的社论《致读者》。社论提出:“我们认为需要使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就是要使《解放日

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对《解放日报》提出批评意见:“《解放日报》今年四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总结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讨论如何增强党性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如何更好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一直到1944年2月16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周年》止,在1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解放日报》在改版工作中确立的一系列党报工作的原则和由此产生的一整套方法,奠定了党报工作的理论基础,对党的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7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没有再办机关报,而是加强了新华社的工作。

延安时期,这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管理的红色新闻山,为党的新闻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传统。这些传统代代相传,绵延至今,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成为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我党新闻事业前进的道路。

长征

第5010期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这是全军唯一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建制单位,也是全军最早被授予荣誉称号的师旅级单位。这就是被誉为“陆军窗口”的部队——“光荣的临汾旅”。

“临汾旅”光荣称号的由来与70多年前那场历时2个多月的临汾攻坚战是分不开的。当时的临汾城是同蒲铁路枢纽,是汾河下游物资集散中心和晋南战略要地,拥有坚固的城防体系和设施,是国民党军在晋南固守的重要战略据点。

1947年运城解放后,临汾已成为晋南的一座孤城。为攻克临汾,全部解放晋南,中央军委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任司令员,组织前方指挥所,率部解放临汾。

国民党守军构筑起由外围警戒阵地、护城阵地、外壕和城墙主阵地及城内纵深阵地和地道工事组成的4道防线,打算凭借工事固守,负隅顽抗。

1948年3月7日,临汾战役正式打响。面对守城的2.5万多名敌人,以及固若金汤的防线,我军在战斗初期的进展并不顺利。徐向前司令员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回兵。随后,他向参战部队宣布:“哪个旅率先破城,就授予哪个旅‘临汾旅’荣誉称号。”

4月1日,前方指挥部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兵器先打临汾城东门。受领任务后,“临汾旅”的前身——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第23旅在首任旅长黄定基的带领下,向城关东北发起进攻。由于城防坚固,我军缺乏强有力的炮火支援,人力物力消耗很大。通过了解部队作战情况,徐向前认为:“坑道是对付敌人的最好手段……我们要用‘土行孙’的办法攻打临汾。”战士们用手指代替铁锹,用膝盖代替脚板,用弹药箱代替小平车,无声无息地进行坑道作业。经过10天顽强战斗,该旅与友邻部队挖掘的4条坑道有3条同时爆破成功,突击队趁硝烟弥漫迅速登城,并乘胜迅猛向纵深发展。

东关攻破后,第23旅进行了第二次土工作业。守敌针锋相对,双方展开了以挖对挖、以炸对炸的拉锯战。经过27天激烈斗争,我军终于成功地把两条长110多米的破城坑道挖至城墙,炸药装填完毕,随着山崩地裂一声巨响,临汾城墙被炸开两个大缺口。由第23旅第68团和第69团组成的两支攻城突击队迅速登上城墙,向城墙两侧和纵深突击。经过激烈巷战,我军全歼守敌,战

开创城市攻坚作战成功范例

「光荣的临汾旅」战旗

役结束。

临汾战役历时72天,共毙伤俘国民党军2.5万人,俘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德。

在临汾攻坚战中,第8纵队第23旅战功卓著,中央军委授予其“临汾旅”光荣称号。毛泽东称赞临汾战役是“开创了城市攻坚作战的成功范例”。



年轻雄鹰飞出胜利航迹

熊华明 郭海洋

史料撷珍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志愿军空军于同年12月也赴朝作战。

边打边建,走上空战舞台

中国人民志愿军地面部队入朝作战初期,完全没有制空权。严峻的战争形势,要求志愿军空军必须迅速开赴前线,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连同海军舰载机在内,美国空中兵力共有14个联(大队),各型作战飞机1100余架。而刚组建不到1年的人民空军,此时仅有新组建的2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轰炸机团、1个强击机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虽然双方空中兵力对比悬殊,但并没有动摇我志愿军空军赴朝作战的决心。

人民空军是在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指战员虽有丰富的陆军作战经验,但空中作战对他们来说还是全新的课题。1950年10月底,空军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组织志愿军空军赴朝作战的问题,认为不能等到练好再打,只能是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那时,年轻的人民空军既要担负国内防空任务,又要组成志愿军空军赴朝作战,依靠现有的几支航空兵部队根本不够。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力支持下,空军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以最大努力加速组建新部队。从1950年11月下旬至1953年3月,在首批组建的基础上,空军又分4批组建了24个航空兵师、56个航空兵团。

1950年12月,志愿军空军开始以大队为单位进驻前哨机场进行实战练习。12月21日,志愿军空军第4师第10

团28大队首先从驻地辽阳开赴安东浪头机场。

1951年1月21日,该大队5名年轻飞行员在大队长李汉率领下,击伤美机1架。这是志愿军空军历史上的第一次空战。8天后,李汉再次率领8架飞机飞向战区,在战友的配合和掩护下,李汉击落、击伤美机各1架。这是志愿军空军首次击落美国空军的飞机。这次空战胜利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军事意义,李汉和战友们用实际行动证明,美国空军同美国陆军一样,在战场上是可以被打败的。

随后,志愿军空军第4师第10团29、30大队和第12团的各个大队,也先后进驻安东浪头机场进行实战练习。至3月2日,第4师完成了实战练习任务。在整个实战练习中,全师共战斗出动战飞机28批145架次,其中4批24架次与美国空军进行了空战,击落美机1架,击伤美机2架。

轮番上阵,接受战火洗礼

为粉碎美空军“绞杀战”计划,按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志愿军空军从1951年9月起,采取轮番进入,由少到多、以老带新、老新结合,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办法,以师为单位陆续参战。

1951年9月12日,经过实战练习的第4师再次开赴安东前线,拉开了志愿军空军轮番参战的序幕。10月20日,在第4师奉命休整的同一天,第3师开赴安东前线,担任掩护秦川一带新建机场和平壤至安东一线交通运输的任务。11月,志愿军空军轰炸机部队第8、10师在歼击机第2、3师的侦察照相支持和空中掩护下,对大、小和岛进行轰炸,配合志愿军第50师所属部队攻克大、小和岛及其附近的岬岛、炭岛。这是志愿军空军轰炸机部队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勇士们不仅圆满完成了轰炸任务,还在空战中开创了以图-2型“活塞式”轰炸机击落F-86喷气式战斗机、

以拉-11型“活塞式”战斗机击落、击伤F-86喷气式战斗机的奇迹。

1951年11月间,空军决定由已经参战的第3、4师带领新部队作战。自11月16日开始,第14、6、15、12、17、18师也陆续转到一、二线机场参战或准备参战。截至1952年5月底,志愿军空军已有9个师18个团的歼击机部队和2个轰炸师的部分部队参战,参战飞行员447名,其中有轰炸机空勤组28个。战斗出动680批、1.11万架次,空战85批、1602架次,击落美机123架、击伤43架。

轮番进驻的各部队稳扎稳打,摸索前进,逐步积累作战经验,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各部队通常先在没有敌情顾虑的情况下飞战区航线,熟悉战区地形;再在敌情不很严重的情况下进行战斗飞行;逐步过渡到在敌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进行战斗飞行。空战中,各部队先在老部队带领下作战,后独立作战;先打战斗轰炸机小机群,后打F-86小机群,再参加打大机群。

1952年4至5月间,美方仍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极力拖延停战谈判,并企图再次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要求志愿军空军歼击机部队进行第二番作战,当时称之为“加打一番”作战。这一阶段的作战,从1952年6月开始,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在此期间,指挥机构亦进行了轮番锻炼。从1952年9月开始,华东军区空军的指挥机构接替了志愿军空军的指挥任务,并由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担任志愿军空军代司令员,接替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

志愿军空军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共有歼击航空兵10个师21个团,轰炸航空兵2个师3个大队,784名飞行人员,59733名地面人员得到了实战锤炼。

英雄辈出,敢于长空亮剑

在朝鲜空战场上,美国飞行员大部